

皇書五元篇所

皇書五元篇所
下多...
天...
...

274456

龐
樸著

帛書五行篇研究

齊魯書社



淮陰師院圖書館 728260

關
樂
著

帛書五行篇研究

龐 樸著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山東人民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32開本 4.75印張 5插頁 71千字

1980年7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2版

1988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數 1801—3300

ISBN 7—5333—0067—X

K·9 定價：2.20圓

齊
魯
書
社

再版前言

以前胡適說過一句話：「發現一個字，就好比發現一顆恆星。」後來這句話也受到批判，說是鼓吹煩瑣考證，宣傳實用主義，輕一點的，也說他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

其實也不盡然。

天文學上發現一顆恆星，往往並沒有多大實用價值，至少並不比發現一顆太陽系行星（如果還有的話）的實用價值大。而文史學科裏發現一個字，如果因此解決或引向解決學科上一個難題的話，其價值倒不能算小。至於自誇不自誇，那又當別論，也自有公論。因為發現有時是偶然的，對於發現者來說，幸運的成份或許比能力的因素更大。

274456

一九七五年，我便曾偶然發現過一個字——「聖」字，那是從馬王堆帛書的佚書

裏發現的，它幫我弄通了思孟五行說的內容。由此做成的幾篇文章，竟博得海內外有關學者的關注，贊成的有，反對的也有。為了求得進一步討論，八〇年夏天，我把那幾篇文章匯集成冊，取名《帛書五行篇研究》，請齊魯書社刊行。

書的第一版只印了一次，可憐巴巴的，印了一千八百冊，大概是印數最少的一類書了。但是發行後，其反響之強烈，却出人意料。

一九八一年，有四川李耀仙的《子思孟子五行說考辨》刊於香港《抖擻》第四十五期；翌年，有北京趙光賢的《新五行說商榷》刊於《文史》第十四輯。在國外，一九八五年三月，日本影山輝國發表了《思孟五行說——其多種解釋與龐樸說》，載於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科紀要》第八十一輯；十二月，淺野裕一發表了《帛書五行篇的思想史地位》，載於島根大學《教育學部紀要（人文・社會科學）》第十九卷。此外還有前此發表的島森哲男的《馬王堆出土儒家古佚書考》（《東方學》第五十六輯，一九七八年七月）、西德慕尼黑大學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的「帛書五行篇講座」，都對那個聖字發生了興趣，對思孟五行說進行了新的討論。一個字的發現可以引起如此波瀾，價值大小且不管它，其作為學

術史上一樁小小的軼事，至少是算得上。

當年我發現那個字以後，由於興奮，也為了爭先，就先寫了一篇《馬王堆帛書解開了思孟五行說古謎》的劄記，放在抽屜裏，四人幫一倒，便整理成文拋出去，總算未落在外國人後邊，由我們自己用我們的發現解答了我們的難題。當時還來不及就《五行篇》本身的内容作系統研究。後來小冊子出版了，名曰《帛書五行篇研究》，偏偏缺少對該篇本身内容的研究，總覺得是一大憾事，對讀者心存歉疚。

另外還有一點難以心安的是，當年用來作為校注底本的一九七四年版馬王堆漢墓整理小組的釋文，在我那小冊子問世不久，便由更為精確的一九八〇年版的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的釋文所取代。我在校注中所做的校勘，除《經》《說》之分別、錯簡之推定外，其他不少常規校法，在新釋文中多亦校出。此時，我仍被淘汰的那本急就章為底本，無視整理諸公的新成果，自然是很不適當的。何況，我還發現了自己的幾條必須改正的錯校呢！

有鑒於此，我時有對《帛書五行篇研究》進行改版的願望，但却一直遲遲未能

着手。八六年初，傅敏怡先生來華討論《五行篇》；同年夏，影山先生寄來了日本有關論文的副本。這些，對我都是一個促進。八七年，中國孔子基金會與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又有「儒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之舉，索稿孔亟，於是決定趕寫《帛書五行篇評述》，既以應會，亦以補十二年前舊憾。稿成，更以新釋文為底本，對原校注進行改寫。於是，全書再版的事，便自然提上了日程。

誰都知道，在今天出這種書，繁體字，古怪字，詰屈聱牙，工本費隨之加大，征不到多少訂貨，印數隨之降低，賠錢是鑄定的了。齊魯書社本着促進學術研究，繁榮文化生活的一貫宗旨，又一次慷慨相助，使我的遺憾得以消除，不安得以解決，使這本小冊子得以修訂再版，是值得大大鳴謝的。

一九八七年清明節於北京

去，學算未嘗計於國人對數，由幾門自五甲與門前幾與幾了幾門的幾門。當判書報關了思蓋正行端古端之的略端，效主曲風算，四人第一圖，到幾與如文端出當半幾幾與幾門字以對，由幾與幾，出幾了幾求，幾式寫了一篇《馬王堆帛書史上一書小小節辦事，至少是算算上節。

初版前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一批。翌年，文物出版社發表影印圖版及釋文，引起學術界極大興趣。其《老子》甲本卷後附錄之古佚書一、四兩種，係思孟學派佚著，於解答久訟不已之思孟五行說，大有助益。七五年十月，余試校注佚書之一《五行篇》，草擬《馬王堆帛書解開了思孟五行說古謎》一文。文章於《文物》七七年十期發表後，頗得國內外有關學者關注。於是，復就文獻所及，作《思孟五行新考》，并脫稿《校注》，分刊於北京、上海文史刊物。竊以為，思孟五行公案，於此可望告一結束矣。故集三文為一冊，附以圖版及佚書之四釋文，請齊魯書社刊行。

一九八〇年夏於青島旅次

目錄

再版前言		(一)
初版前記		(一)
代序		(一)
——馬王堆帛書解開了思孟五行說古謎		(一)
圖版		(三)
釋文		(三五)
校注		(四三)
評述		(九〇)
附錄		(九〇)
——思孟五行新考		(二四)

馬王堆帛書解開了思孟五行說古謎（代序）

荀況於《非十二子》篇批判子思、孟軻學派時說：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膺儒，嚙嚙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荀況這一篇檄文的詞義很是激烈，可是思孟五行說的内容究竟是什麼，却隻字未提。或許在他當時，因為思孟的原書俱在，「受而傳之」的「俗儒」又復不少，

並無說明的必要吧？他決不會料到，時過境遷，原意湮滅，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他所指的思孟五行說，對於後人，竟成了千古不解之謎。

頭一個出來解謎的，是一千有零年以後的唐人楊倞。楊注《荀子》「謂之五行」句說：「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他是根據什麼斷定這個「五行」就是「五常」的，也隻字未提。或許在他那個時候，也無說明的必要吧？因為自從董仲舒以「仁智信義禮」配五行「木火土金水」（見《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班固又宣布前者為「五常」（見《白虎通·情性》）以後，這「五行」和「五常」，在注疏家手裏，就常被根據解經的需要而交互使用，不必多做任何說明了。例如，鄭玄注《樂記》「道五常之行」句說：「五常，五行也。」成玄英注《莊子·天運》「天有六極五常」句也說：「五常，謂五行。」既然有人用「五行」來解釋「五常」於前，楊倞當然可以用「五常」來解釋「五行」於後了。何況，鄭玄在注釋早被指認為子思所作的《中庸》時，開宗明義頭一章，就用了「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的話來暗示子思的五行說，這已是衆所周知的常識了。所以，楊倞只是簡單地宣布一下：「五行——五常」，既不說明根

據，又不進行論證，也不見有誰出來表示懷疑。這種情況，在當時的社會裏，是自然而又必然的。因為，所謂「五常」，不過是被上昇為絕對律令了的統治階級的道德教條；而所謂「五行」，則又是被神秘化了的宇宙構成圖式。使道德觀服從宇宙觀，或用宇宙觀來範圍道德觀，本是任何一元論哲學的理論要求。從董仲舒那個時候起，中國封建地主階級已經基本上完成了這個工作，構築了一個統轄一切的龐大而又神秘的哲學體系。此後，剩下的理論工作，祇是使一切新發生和新發現的問題去適應這個體系，並用這個體系去解釋此前直至開天闢地時候的一切問題，而不必懷疑有無足夠的根據和進行必要的論證。因為，這個體系，已經被「證明」為「天經地義」了，正如這個階級相信自己的統治是「天經地義」一樣。祇是這樣一來，在荀況那裏曾有過的對思孟學派的幾分批判精神，到此已完全蛻變為頂禮膜拜，而關於思孟的五行說，並沒有給人提供出正確的答案。

這樣又過了一千有零年。

到了近代，隨着資產階級嶄露頭角，章太炎重新提起這個問題。他認為，思孟的五行說，還不簡單地就是「五常」，而且更有「以水火土比父母于子」這樣

的「五倫」內容；它上承「古者《洪範》九疇舉五行傳人事」的未彰之義，下啟「燕齊怪迂之士」「耀世誣人」的神奇之說，「宜哉荀卿以為譏也」（見《子思孟軻五行說》，《章氏叢書》）

同章太炎說法差不多的有梁啟超。他認為，思孟的五行說，或者是指君臣、父子等「五倫」，因為《中庸》裏面以之為「天下之達道」，而「道」有「行」義；或者是指「仁義」等「五常」，因為子思「或《中庸》外尚有著述」，而「孟子則恒言仁義禮智」。總之，「決非如後世之五行說，則可斷言耳」（見《陰陽五行說之來歷》，《東方雜誌》第二〇卷第一〇號）。

章梁的說法代表了他們這些人中的一種傾向。其另一傾向為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在這個問題上發了言的代表人物有劉節和顧頡剛。他們不約而同地先後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設，從根本上否定了思孟與五行說的關係，認為：宣傳五行說的本是鄒衍，不是孟軻，由於鄒、孟都是鄒人，學說都流行於齊魯之間，甚至有部分類同（他們認為鄒衍也是儒家），因而在「傳說中誤合為一人」；以至荀況錯把鄒衍的五行當做孟軻的學說來批評了。又因孟軻受業於子思的門人，從而連

累及子思。他們的結論是：這實在是一樁歷史性的大誤會（見劉節：《洪範疏證》、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均載《古史辨》第五冊）。

這幾位學者不以封建經師無論據的說法為滿足，另闢蹊徑尋求新解，給了人們以一定的啟發；也反映了過去的「天經地義」已經失效，資產階級要建立自己的樂園的社會動向。可惜的是，他們或者由於同過去聯繫太深，一時跳不出舊的窠臼；或者對過去不知分析，全盤給予否定，無端加以懷疑。因而，他們並不能真正破掉舊的體系，也不能真正建立自己的體系；在思孟五行說的問題上，也未給人們留下什麼積極的東西。

一潭死水被如此攪動了兩下，除了岸邊留下些許濕痕外，慢慢又回復到老樣子。

一些力圖用唯物史觀指導自己思想的學者崛起了。他們馳騁於五千年間，也接觸到了我們這裏所討論的問題。

范文瀾認為，五行家的本領在「推氣運」以及「懂得科學的曆法和迷信的占星」。他引《孟子》上談論「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兩段（《公孫丑下》、《盡

心下》），證明從「《孟子》七篇，很看到些氣運終始的痕迹」；又引「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離婁下》）及「天時不如地利」（《公孫丑下》）兩段，說明孟軻也懂曆法和占星術。結論是：「原始的五行說，經孟子推闡之下，已是栩栩欲活；接着鄒衍大鼓吹起來，成了正式的神化五行。」（見《與頤剛論五行說的起源》，《燕京大學史學年報》第三期，一九三一年）

郭沫若則另創新解，認為思孟所造的五行說是「仁義禮智誠」。他引《孟子》的「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而發揮說：「『天道』是什麼呢？就是『誠』。」「其在《中庸》，則是說：『誠者天之道也』。」他提請讀者注意：思孟書中除大談「仁義禮智」外，「更把『誠』當成了萬物的本體，其所以然的原故不就是因为誠信是位於五行之中極的嗎？」於是他結論曰：「故爾在思孟書中雖然沒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字面，而五行系統的演化確實是存在着的。」（見《儒家八派的批判》，載《十批判書》）

范、郭二老的見解，把問題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這裏，不是捫燭扣槃，而是

力圖從思孟思想的全體着眼，不再泥於舊轍，而是要重新審查五行說和思孟書的全部歷史材料。這樣做去，縱然一時所得的具體結論不盡符合歷史真實，而方法既然對了，迷宮的出口當不會很遠。

大家在向前探索着，並期待着新的發現。

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長沙馬王堆第三號漢墓出土了一批帛書。其中有兩卷帛上分別抄着兩部《老子》，現在叫做甲本和乙本。甲本的卷後和乙本的卷前，各抄有四篇佚書。佚書和《老子》沒有直接關連，內容也很龐雜，有黃老家言，也有儒家學說。甲本卷後的第一篇和第四篇佚書，屬於儒家思孟學派，給解開兩千多年未得其解的思孟五行說之謎，帶來了一把鑰匙。

《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之一，無篇題，共一百八十二行（自帛書原第一七〇行至第三五一），原分十九段，約五千四百字，字近篆體。從文中不避「邦」字（第三四二行有「邦人之廁」）推測，抄寫年代當在漢高祖劉邦卒年（公元前

一九五五年以前^①，而從字體及其儒學內容來看，又應是抄寫於秦亡（前二〇七年）之後。這個抄寫的年代，是可以大致確定的。

至於它的寫作年代以及作者和篇名，尚無法確指。帛書出土時已有脫爛，加之內容上辭義重複，因而乍一讀去，幾乎無法理出一個頭緒來。可是耐心細讀幾遍以後，將會發現，這篇佚書原由兩個部分組成：自第一七〇行至第二一四行，即原第一大段，為第一部分；自第二一五行的提行另段開始，直至末尾第三五一，為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若干命題和基本原理，第二部分則對這些命題和原理進行了解說。這是戰國時期的一種文章格局。《管子》、《墨子》、《呂氏春秋》、《韓非子》等書中，都有這種篇章。照當時的習慣說法，這第一部分叫《經》，或有一個切合內容的題目某某，第二部分叫《說》，或者叫《某某解》。按照這種格局去讀這篇佚書，更將發現，現存的第一部分即《經》的部分，內容是完整的，首尾一貫的，而第二部分的前面，則應有闕文。因為現存的第二

① 古人「卒哭乃諱」（《禮記·曲禮》），並見《檀弓》、《雜記》，生者不相避名。至漢景帝時，始有生諱之例。有人據「邦」字斷定甲本抄於漢高祖建國之前，不足訓。